

对利率的二阶导数再除以租赁价值得到,或者可以通过计算久期对利率的导数再除以租赁价值得到:

$$C = \frac{dD^*}{di} = \frac{1}{p} \frac{d^2 p}{di^2} = \frac{1}{p(1+i)^T} \sum_{t=1}^T \frac{(t+1)R_t}{(1+i)^t}$$

凸性是以时间的平方为单位来测量的。

为了考查凸性特征,可以对把租赁价值回报率或与租赁价值相关变化进行泰勒二阶展开来逼近:

$$\frac{dp}{p} = \frac{1}{p} \frac{dp}{di} di + (1+2p) \frac{d^2 p}{di^2} (di)^2 = -D^* di + \frac{1}{2} C (di)^2$$

由此式可以看出,当 i 变化时较小时,凸性项可以忽略,但当利率波动较大时,凸性作用就变得很重要。

与久期一样,公司租赁投资组合的凸性可以通过加权平均来得到:

$$C_p = \sum_{i=1}^N x_i C_i$$

其中 C_p 为组合的凸性, x_i 是第 i 种租赁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其凸性为 C_i 。

灵敏度方法在租赁风险应用中有一个缺陷,即它只告诉一个相对比例,没有回答某一租赁投资组合的风险值到底有多大。因而在风险管理中难以把握。因为利率的真正变化无法知道,它是随机的,必须用概率分布才能描述。

另一种衡量风险的方法是统计方法,用收益标准差(和协方差)来描述。实际上,收益的波动是一个随机变量,它可以通过概率描述来说明一定概率水平下投资(组合)的可能损失有多大。这就是 VAR 方法。它已成为金融机构内部风险管理的最新方法。

在金融租赁投资中,VAR 可以反映在一定概率(置信度)下,租赁投资(组合)在未来特定时期内最大可能损失。VAR 用于测量租赁利率变动的风险(在涉及外汇流量时,还反映汇率变动)。可表示为:

$$P(\Delta P > \text{VAR}) = 1 - c$$

其中 ΔP 为租赁投资(组合)在持有期 Δt 内的损失,VAR 为置信水平 c 下处于风险中的价值。如公司在一个星期内在 99% 置信度下的 VAR 为 100 万元。

测试 VAR 的方法主要有历史模拟法,德尔塔-正态方法和 Monte Carlo 模拟法等。我国市场利率化尚未实现,所以在估计利率变量变化时,难以用这些市场化方法来估算概率分布,这样极限测试就是一种比较好的替代方法。

在极限测试中,可以选择一个或一组市场变动因素,然后模拟目前的投资组合在这些因素变动时所发生的价值变化。把 VAR 与极限测试和情景分析结合起来,对金融租赁风险管理可起到一个整体的、全方位的风险测量。

[责任编辑 曾建林]

·论点摘编·

福柯与马克思主义

苻浩

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中,福柯不仅有着显著声誉,而且他与马克思主义还有着为人所知的十分密切的关系。1953年,福柯加入过法国共产党,虽然此后他又退了党,并且表示与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同的立场,但马克思主义对福柯确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

就笔者来看,福柯对马克思有着无可逃避的传承、发扬关系。而这正体现在对自由的追求、对现存的颠覆及对理论的实践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右派因为维希政府的卖国行径而声名狼藉,意识形态差不多已成为左派一统天下的局面。法国共产党因为它的坚决抵抗立场而深得人心。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当时的存在主义大师萨特也改变了战前他于《存在与虚无》中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声明支持法国共产党。西蒙·波伏娃在《回忆录》中认为,是抵

抗运动和做战俘的经历让萨特理解了历史和行为的意义。另一方面,战后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年轻人对苏联充满了好感,阿尔都塞以法国共产党员的身份执教哲学,影响很大。在理论界,法国哲学界对自己进行了反思,萨特与梅洛-庞蒂致力于将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1964年,萨特在谈到他的长篇小说《厌恶》时承认:“在《厌恶》中,使我感到遗憾的的是,我并没有完全把自己放进去。”;“那时我缺乏对现实的感受,后来我变了,我逐渐接触了现实,我看到了许多孩子因饥饿而死去。面对一个奄奄一息的孩子《厌恶》实在是无足轻重”。1944年,萨特在接受彼耶尔·劳尔盖采访时说:“战争使我懂得了必须介入。”(1944年12月21日《新世界》第2期)萨特还认为:“自马克思以后,哲学就是一种具体的社会活动,一种介入”(1951年6月17日《巴黎-新闻-强硬派》)。这一时期的法国是马克思主义的天下。

如上所述,在这种背景下,1950年,福柯加入了法国共产党。福柯是1947年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而在当时,阿尔都塞正在其中执教,可以说,福柯对共产党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阿尔都塞的影响。当时福柯对共产党的态度十分积极,据他所说,他还积极地为法共思想刊物《新批评》写过稿。但1953年,福柯又离开了法共。福柯离党的原因有多种说法,据阿尔都塞的说法,福柯是由于同性恋的倾向。但福柯自己认为是由于自己反感于轰动一时的犹太医生密谋斯大林性命案。但正如萨特所说,实际上,当时西方知识分子已开始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具体的社会活动”,福柯也开始有这种想法,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哲学,而是通往哲学道路上的一种经验。思想认识上的不同,或许才是其真正离开法国共产党的深层原因所在。

在历史必然性上,可以说福柯与马克思持一致的反对态度。历史必然论的典型就是黑格尔。黑格尔认为,政治无一例外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政治家在历史的必然规律面前,除了去顺应它,别的毫无办法。倒是超脱于历史事件之外的哲学家们,可以在历史事件发生之后,居高临下地来评说他们。这里虽然隐含着黑格尔故意以抬高哲学家贬低政治家的方式来表示对当时政治现实的不满的意思。但事实却是造成了人对历史无能为力的历史必然论。马克思在批判地接受黑格尔的传统,承认历史有规律地发展的同时,提出了人民创造历史这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理论不是高高地在上,而是应投身到实践中来。

对于历史必然论,福柯则提出了历史的断续性理论。福柯认为历史的观念本身,就是肯定了断续性。因为过去之能够作为研究对象,完全是因为它不同于现在,同现在断裂了开来。断续性曾经是史学家刻意想要从历史删掉的东西,但是今天它已成为历史分析的关键所在。断续性是史学家描述的结果而不是他的分析要删除的东西。因为史学家要发现的东西,正是某一过程的界限、某一条曲线的转折点等等。但福柯的断续性是个矛盾的概念。他指出,当我们描述认识论的界限、人口曲线的逆转,或一种技术对另一种技术的替代时,我们所言及的断续性不是同样的。断续性归根到底是一个悖论,它既是研究的工具,又是研究的对象,而且它界定着它自己作为其结果的那块领地。

福柯反对唯心主义的历史必然论,但不表示他赞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福柯反对历史的所谓客观性,认为历史作为一个时代话语实践的产物,布满了这个时代的权力结构。由此产生了福柯传统的新历史主义,他强调历史文化的大多数形式都存在于话语之中,既然历史自身是一个需加阐释的文本,在同“现实”的关系之中,它并不享有特权,那么,把历史认为是基础,是客观,就只能是虚幻了。

福柯的历史学要表明,今天并不是某种无以避免的历史必然性结果,相反它源出无数非常具体的人文实践,也只能为其他实践所更改。在对历史和历史极限的研究当中,人可以从其中见出自己的极限,进而来尝试超越这些极限。

罗伊·博伊恩在《福柯与德里达》中认为,在德里达、福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可以找到贯穿其中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马克思特别强调要“改造世界”。马克思通过对剩余价值的发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的虚伪性,但与以往哲学家更深刻的是,马克思主义还认识到了实践的重要性,认识到光是揭示还是不够的,还需动员无产阶级起来改造这个“虚伪”的世界。这就是实践的重要意义。福柯同样对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持批评的态度。马克思所揭开的历史或理论问题是摆在现代所有哲学家面前的一道无可回避的难题。但与马克思主张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不同,福柯不主张暴力,他以他的哲学理论试图对现今的语言文字进行一次彻底的思想上的革命。他以写作颠狂等历史边缘的东西来颠覆以往的历史观,以知识考古、权力关系学等来揭示他所谓的历史真相。如果说马克思提出以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为历史的必然有着令人信服的理论,与现实依据的话,那么,在福柯那儿,这个现实问题就不好回答。就福柯的观点来看,社会的根本变革寄希望于理

性几无可能。但非理性的癫狂、同性恋、犯人、失业者、少数民族、儿童、妇女、残疾人等这些所有构成福柯边缘性话语的人,似乎也都难以担当起出任一代新人的重任。同样,福柯将断续性、偶然性、歧变、谬误、失算等视为上述边缘性话语的存在基础,反传统的态势固然鲜明强烈,但以此来建构新现实这一宏大话语,似乎也难以让人信服(参见陆扬《后现代性的文本阐释:福柯与德里达》,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在《词与物》中,福柯提出,作为政治学的知识,马克思主义并无任何突出之处。在《监禁与惩罚》和《知识意欲》中,福柯也显示了他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他认为,正如右派依据宪法、君权等法律术语提出权力问题将苏联称为极权主义,是不够正确的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将西方资本主义斥责为腐朽的阶级统治形式,同样是没有去深入分析权力的内在机制。而权力的内在机制是无所不在的,远不仅仅是上层建筑的故事。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的概念福柯也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一个很难处理,不可轻易去使用的概念。原因是意识形态总是与真理处在对立状态,总是在指称有关主体的某种秩序,也总是为作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所决定。除贬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外,对于马克思的权力理论,福柯认为,他不同意马克思假定经济关系的再生产是权力关系的主要功能,其他一切权力关系都在效法经济剥削的某种形式。福柯称他不反对权力关系受制于经济关系,但是要强调权力关系决不是在所有的领域中都一模一样,并且受制于一个预先给定的中心原则。他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将权力关系等同于国家机构的倾向,认为这样做要么是忽视了政治学和国家领域之外的权力关系,要么是把所有权力关系都归结到了国家关系名下。

在福柯那儿,权力并不会因受到抵抗而发生变化,而只会导致重复。由此可以理解,在福柯看来,被压迫阶级奋起反抗夺取统治手中权力的行为,既然不可能导致权力本身革命性地变化,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这里,充分暴露了其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企图。实际上,他的理论一碰到实践问题,就又不回到马克思那儿去了。但福柯在揭示实践的复杂性上也是有其深度的。福柯指出:“理论并不表达和转译实践,也不服务于实践的运用:它就是实践。”这是福柯将理论也上升到了实践,表明他对理论的更重视,由此也解释了他之所以如此执着于理论而无动于实践的原因了(参见德鲁兹《作者不:一名新的制图员》,载《批评》1975年第343期)。与马克思相比,福柯虽然以通过将理论上升为实践的做法来弥补其在实践性上的不足,但实际是在实践上退缩了一大步。

福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可以说,在揭穿资本主义永恒真理的神话这一点上,两人基本上是一致的。福柯虽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许多批评家认为,福柯即使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其绝对具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参见Mark Poster, Foucault, *Marxism and History: Mode of Production versus Mode of Inform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实际上,对于福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各家众说纷纭,但都表明一点,即两者已越来越成为当代西方思想研究的关注点。

[责任编辑 徐枫]